

# 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动因、 制约因素及实现路径

胡艳萍

(合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并强调中国始终保持积极的姿态投身于全球治理当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使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能够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前进。同时,21世纪的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努力扩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网络覆盖面,使得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建树颇丰,引领示范效应突出,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为何要积极投身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伟大实践,中国在积极投身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都取得了哪些经验,中国还应在哪些方向上着力和发力,进一步推动这一变革进程,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全球治理;治理体系;“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9.014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现有国际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并强调中国始终保持积极的姿态投身于全球治理当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不但迅速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而且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发动机。在这背后反映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的变化,即从全面的参与者转向了积

极的推动者。中国不再仅仅局限于深入而广泛地参与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而是积极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 一、中国投身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践的现实动因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以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绝对实力优势,并获得国际社会一定程度认可的产物。因此,这一治理体系所衍生出的各种制度和机制——无论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乃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其治理结构、议程设置、规则制定等,各方面都打上了鲜明的“美国优

先”烙印。这是因为任何制度在本质上都是非价值中立的,就是说相同的制度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长期以来,在某种所谓先进制度的安排下,特别是面对个体化需求时,那些已经从既有制度红利中或在未来极有可能从既有制度红利中获得实惠的个人、团体、组织,必然会竭力维护之,并论证其存在和提升的合理性和必然性。<sup>[1]</sup>这些制度延续至今,并且其结构和规则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从历史上看,这些制度对于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确实做出过重大贡献,推动了发达经济体迅速摆脱二战所造成的破坏,加速了国家重建。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制度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发展以及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某些全球问题的解决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其运作机制和治理结构对于当今世界而言也仍然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这些制度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基础之上的,反映的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外围”二元格局。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国际话语权和议事能力的分配日趋多元化,这些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既有的国际制度产生初期,尽管存在着以“中心—外围”结构表现出的不平等,但是由于当时发达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很少有国家会对这些制度的不合理之处提出质疑,或者即使有不同声音也会被压制。正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所言,各种制度反映了它们最初产生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并且鼓励不同的人群对于社会秩序所拥有的集体概念同这种权力关系保持一致。<sup>[2]</sup>但是,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广大中小国家而言,是否加入这些国际制度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这是因为,由于非中心不平等效应的存在,制度总是有利于那些可以参与制度规则的制定,并且在制度中具有较高权威的国家。由于在制度外达成协议的成本较高,而在制度内又处于不利地位,弱小国家

无论是否加入制度都无法有效维护其利益。<sup>[3]</sup>因此,从本质上讲,制度非中心不平等背后所隐含的是国家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制度的规则设计和日程设定也反映了各成员国之间事实上的和潜在的相对地位,同时制度的规则也制约了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是突破了这种格局,中国日益成为“中心—外围”之外的单独一极,“二元依附格局”正在转变成今天的“中心—外围—中国”之间的一种“三元互动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中国依靠特色鲜明的制度安排、独立自主的产业集群和多元多极的国内市场,同时成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中国与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融合大格局。<sup>[4]</sup>

但近年来,作为现有国际制度的主要建立者和推动者,以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者的美国,不断兜售“美国优先”,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移民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欧洲方面,英国脱欧和难民涌入,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极右翼势力坐大,经济政策和全球化姿态趋于保守,欧盟一体化前景堪忧。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如美元的霸权地位推动了美国产业结构的“空心化”,从而导致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制造业大量流出美国,以至于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出现了所谓的“铁锈地带”。从国家角度来讲,美国事实上是其自身去工业化的受益者,因为美国只需通过操纵美元霸权就可以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获得大量廉价产品以满足自身消费,同时也可以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对其他国家“剪羊毛”。但是这一进程也造成美国国内失业人数增加等问题,而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既迎合了这些全球化“失意者”的心理,也反映了其自身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倾向。就欧洲而言,其内部问题在于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不平衡,

同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德法两国相比,大部分东欧、南欧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甚至成为欧元区的负担。欧盟过早的货币一体化使很多发展程度较低的欧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自身经济的掌控权,而德法等国则需要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补贴,从而导致欧盟内部国家间矛盾不断加深。就外部而言,欧洲近年来追随美国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以武力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使当地长期陷入内战之中,并出现大量难民,而难民又通过地中海来到欧洲地区,已成为欧洲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一定意义上,难民危机也是由于欧盟一味追随美国干涉西亚北非事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是美国和欧洲的问题引发了深刻的全球危机,特别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蔓延,民粹主义势力不断发展壮大,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上升。当前已有的全球治理架构和机制,愈来愈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其不足和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近年来,由于大国矛盾难以调和,利益冲突不断上升,使得联合国不但对在叙利亚发生的“代理人战争”几乎无能为力,对气候变化、难民移民问题也是力不从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早已动摇了欧美的全球治理观以及IMF、世界银行等传统欧美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sup>[5]</sup>两大机构对贷款强加私有化、放松管制条件等做法受到广泛诟病。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WTO改革之声逐渐高涨。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较大,多边贸易谈判止步不前,改革进程缓慢,很多成员对于难以在多边贸易和国际经济协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表示强烈不满。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多次扬言要退出WTO,发力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强调与主要盟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不断以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和削减双边贸易逆差为借口,对中国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多边贸易的主题格局,反对美方粗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行径,强调国际制度变革要

符合时代发展特征的重要性,绝不能使其走入改革的死胡同。<sup>[6]</sup>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

## 二、中国投身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践的制约因素

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全球经济政治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最大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金砖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他们改变了全球财富增长和权力分配的格局。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当年世界GDP增速为1.853%,而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仍保持高速发展,五国GDP增长率近乎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2~5倍。2009年,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负增长1.674%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仍保持9.4%和7.862%的高速增长。<sup>[7]</sup>2018年,五个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53%,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6.3%,在IMF的总份额占比达14.84%。<sup>[8]</sup>这一强大的对世界经济的支撑力和带动力,使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繁荣与发展方面的实际作用明显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提出了提高发言权和代表性等新诉求。

一方面,原有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机制离不开新兴市场国家。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传统全球治理机制“七国集团”力不从心,未能有效应对危机。尽管“七国集团”在历史上曾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主要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被看作是“发达国家俱乐部”。这一机构在当前则面临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双重危机。特别是该集团将新兴国家排除在外,降低了其在国际社会设置议程和协调全球问题解决的能力。<sup>[9]</sup>金融危机前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二十国集团”则一跃成为应对这场危机的核心治理机制,并迅速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

格为领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充分说明全球治理体系若没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就无法解决任何全球性问题。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又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提出了新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希望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能够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2010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共同发声,要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IMF和世界银行尽快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质性转移投票权,并指出IMF和世界银行高管职位的遴选应无需考虑参选人国籍,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

为了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上述机构的决策中话语权小、投票权不足等问题,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下,2010年4月,世界银行进行投票权改革,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提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47.19%。其中,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由原先的2.77%升至4.42%,提高了1.65%,从世界银行的第六大股东国升至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sup>[10]</sup>巴西、印度的投票权也获得小幅增加。2015年,IMF份额改革方案获通过,中国所占份额从第六位跃至第三位,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份额亦跻身前十。这一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为推进IMF改革进程,多次对其进行增资。尽管美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仍超过15%,对其相关决策仍有“一票否决权”,但IMF和世界银行权力格局的调整表明,其开始正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同时,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参与IMF和世界银行高层竞选。在2011年的IMF总裁竞选和2012年世界银行行长选举中,均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候选人走上竞争舞台的情况,试图打破IMF总裁由欧洲提名人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职位由美国提名人选担任的惯例。尽管最终未能撼动欧美把持的地位,但这充分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多边金融机构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性的诉求。

贸易领域,在发达经济体逐渐走向保护主义、全球面临贸易摩擦升级威胁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也发出了维护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确保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国际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呼声。在2018年“二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前夕,金砖国家领导人就WTO改革问题表明了共同立场,呼吁WTO所有成员反对与WTO规则不符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撤销具有歧视性和限制性的条款,并且强调要维护WTO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反映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同时,金砖国家也再次强调争端解决机制对世贸组织平稳运行的重要性,敦促立即启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维护争端解决体系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获得高度称赞。<sup>[11]</sup>

### 三、中国投身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践的成效经验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为中国迎接风险挑战提供了物质保障和智力支撑。今天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科技发展均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世界也渴望分享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希望中国的发展惠及全球,期待中国为当今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面对新的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勇于承担大国责任,积极介入地区和多边事务,不断进行经验积累和形式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新机制和平台,积极推动和引领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等全球和区域机制建设,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断丰富全球治理的内涵,特别是通过强化地区伙伴关系联通全球治理,打造全新路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变革,全球治理话语权显著增强。

“一带一路”是中国秉承合作共赢理念提出并创立的先进国际合作平台,力图通过跨国和跨地区的合作与协调,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

生态良性发展。2013年,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七年来,有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先后与中国签署了198份合作文件。截至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达到9.27万亿元。继2017年5月中国成功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2019年4月中国举办了意在推动建立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发展路径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为“一带一路”的支柱之一,亚投行则是首个由中国倡议建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有力弥补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它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首先提出筹建倡议,2016年1月正式成立至2020年7月,从57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103个成员国。截至2018年底,亚投行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13个国家批准了35个投资项目,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撬动其他投资近400亿美元。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电信、城市发展等领域。<sup>[12]</sup>有力支持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加强了东西方的经贸合作。

由中国和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五个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南南合作平台,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自2006年起,金砖国家已经形成了以领导人峰会为核心,辅以部长级会议 and 专业化论坛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与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sup>[13]</sup>十年多来,金砖国家领导人共进行了10次正式会晤和8次非正式会晤,共同推动IMF和世界银行改革,推动提高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决策权,积极支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竞选国际机构高管职位,采取共同立场维护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背景下,2017年9

月中国在厦门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创新性地采取“金砖+”模式,邀请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泰国五国领导人出席,围绕“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主题进行讨论对话,使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更新、更强的驱动力。

上合组织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个国家在2001年6月创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成立的宗旨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是其重点合作内容。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上合组织通过制定文件或条约、设立区域反恐机构、开展联合反恐演习等方式,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种区域合作模式不仅维护了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也为全球反恐行动提供了合作的样本。<sup>[14]</sup>2018年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签署了关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9年至2022年合作纲要》等12份决议。2019年6月,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多措并举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篱笆,防范恐怖极端势力回流。要以《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生效为契机,加强去极端化合作,有效遏制极端思想蔓延势头。<sup>[15]</sup>表明反恐合作将继续成为上合组织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也将继续为维护世界政治秩序与安全稳定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 四、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践的策略和实现路径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多边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一面宣扬“本国优先”,却对国内问题自顾不暇,一面将矛头对准中国,对华竞争不断上升。不少西方国家质疑中国将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有人抛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调。面对这一现实,中国有必要消除国际社会的各种怀疑,在理念上引领全球多边治理,在国际实践中展现中国经验和中国

智慧,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加多元的方案,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朝着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为此,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时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sup>[16]</sup>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深入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愿景以及实现路径,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各国主权平等原则,要建立在各国维护国际法权威的基础之上,指出要在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且指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伙伴关系和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sup>[17]</sup>近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一思想理念正日益彰显其时代价值,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书写和制定。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也要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起和主导的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国际组织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垄断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继续以金砖国家、南南合作等机制为依托,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调整,坚决维护和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参与原有全球治理架构和过程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增量改革。随着世界的发

展变化,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体系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变革。但是,这种改革不是随意舍弃,更不是全盘否定、推倒重建,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原有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的内涵,将各国的需求同发展的阶段相结合,从而构建符合各国基本国情的多元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满足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当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挑战,面临生存危机,中国支持对WTO进行必要改革,推动多边贸易体制与时俱进,更好适应时代的发展,但不能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创新完善。

全球治理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涉及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所有政治、经济、环境、安全、人文、法治、伦理、道德等多方面问题。全球治理和“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有机统一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第一次针对全球治理发出的“中国声音”。<sup>[18]</sup>它强调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不能由少数国家所垄断,而要由世界各国共享,同时指出全球治理各种规则和制度应当建立在世界各国协商共识的基础之上,不能成为少数大国强国权力意志的体现。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健康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也不能只听一家之言,需要各国人民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确定符合实际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机制。<sup>[19]</sup>这一理念强调各国共同协商、深化交流,推动各国共同参与、合作共建,倡导各国平等发展、共同分享,在共赢中实现共享。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之下,中国积极致力于构筑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伙伴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当前,中国已经与80多个国家建立了以发展共同利益为准则,以促进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国际合作为路径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伙伴关系网络。<sup>[20]</sup>在伙伴关系中,中国尊重中小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尊

重它们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充分照顾它们合理的利益关切,不会把自身的意志强加给它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付诸实践还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战略支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治理都需要“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是对历史的传承与创新,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当代世界版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有力地统筹了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有效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资源整合与优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继续做好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扩大中国的朋友圈,打造民意基础,保障沿线安全环境。要持续做好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和技术标准对接为切入点,推动中国制造、中国标准走出去,同时深化双向投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要不断做好资金融通,做大做强各类新兴投资运营平台,创新投融资渠道,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高度重视同其他国家进行平等协商,倾听其他国家意见。在涉及“一带一路”的蓝图规划、项目合作等方面,中国都坚持同其他国家进行平等、坦诚的协商和交流,保证各项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并且坚持项目的成果要能够惠及各相关国家,而不是只有利于其中一方。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黄金法则。<sup>[21]</sup>

### 注释:

- [1]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  
 [2]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1981, p. 136.  
 [3]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88, p. 387.  
 [4] 张维为:《中国和平崛起与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的制定》,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9\\_04\\_26\\_499251.shtml](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9_04_26_499251.shtml)。  
 [5] 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

的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6] 陈凤英、孙立鹏:《WTO改革:美国的角色》,《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7] 《GDP增长率(年百分比)》,世界银行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7&start=1961&view=chart>。

[8] 《金砖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gjjjs\\_674249/gjzzy-hygz\\_674253/jzgj\\_674283/gk\\_674285/](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gjjjs_674249/gjzzy-hygz_674253/jzgj_674283/gk_674285/)。

[9] [加]安德鲁·F.库珀、阿加塔·安特科维茨:《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来自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经验》,史明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0] 《世行投票权改革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 [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dhjz/gjjrzz/sjyhjt/rdlj13/tpqgg/201011/t20101112\\_348702.html](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dhjz/gjjrzz/sjyhjt/rdlj13/tpqgg/201011/t20101112_348702.html)。

[11] 《金砖国家就世贸组织改革等问题表明共同立场》,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30/c\\_1123792312.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30/c_1123792312.htm)。

[12] 金立群:《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目标完全一致》,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j/cj/2019-03-26/doc-ihxncv5771917.shtml>。

[13] 朱杰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zzx/gjzzx\\_zzx/201409/t20140918\\_1333030.shtml](http://www.cssn.cn/zzx/gjzzx_zzx/201409/t20140918_1333030.shtml)。

[14] 胡江:《区域合作组织与恐怖主义犯罪防控》,中国法学网, <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x?id=70425>。

[15]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9-06/14/content\\_5400330.htm](http://www.gov.cn/xinwen/2019-06/14/content_5400330.htm)。

[16]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全文)》,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17]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全文)》,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18] 《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全球治理理念》,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0/14/c\\_1116824064.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0/14/c_1116824064.htm)。

[19] 苏格主编:《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2页。

[20]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21] 《王毅谈“一带一路”:系阳光倡议 共商共建共享是黄金法则》,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8-03/08/content\\_50682527.shtml](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8-03/08/content_50682527.shtml)。

〔责任编辑:刘 鑫〕